

如何描繪 台灣的歷史

上水流久彥*



一、前言

在日本社會裏認為，「戰後」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雖然有關「戰後」的結束顯示出各式各樣的看法¹，在起初的認知上恐怕沒有太大的差異。例如，並非說在1945年8月6日、9日或14日進入戰後。日本在1945年8月14日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並且在8月15日通知國民。然後，在日本社會裡認為8月15日是「終戰紀念日」，在一般認知上，日本的「戰後」就是以那天為界線開始。在日本的歷史上，1945年的8月15日區分了「戰前」和「戰後」，成為在時間上表示兩個「斷絕」²的記號。

但是，這個所謂1945年8月15日的劃分，對於在大日本帝國下的殖民地台灣，同樣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嗎？在台灣從1997年到2002年國民中學所使用的教科書中，做了以下的敘述：

提綱

民國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臺灣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由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措施失當，而於三十六年爆發「二二八事件」。……

第一節 初期政治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設立與臺灣的接收

民國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三年)底，中、美、英三國領袖發表開羅宣言，宣示戰後日本應將中國東北、臺灣、澎湖等歸還中華民國。翌年，中央政府設立臺灣調查委員會，展開接收的準備工作。

* 上水流久彦 縣立廣島女子大學國際文化學部

1 由政治體制的變化和經濟復甦、生活的水準等等，「戰後的結束」被廣為討論。

2 例如，以「戰前」為軍國主義的黑暗世界，將「戰前」的行為為特殊的事情和民主主義社會的「戰後」分開來思考等等。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政府隨即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負責接收。臺灣民眾熱烈歡迎前來接收的軍政人員。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舉行受降典禮和慶祝台灣光復大會，臺灣正式脫離日本的殖民地統治，而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並訂這一天為「臺灣光復節」。（國立編譯館 1993：85 - 86）

從以上的記述，可以看出對中華民國而言1945年10月25日是代表一個有轉折點意味的日子。可以看出並非日本向國民宣布投降的8月15日，中華民國取回臺灣的那天才是它的涵義。

由這裡可見對日本和中華民國過去認知的差異，故述說歷史的立場也就不同。但是，這個差異始終是站在國家的立場，這個立場也未必束縛研究者個人的觀點。因為身為日本的研究者，用日本國的觀點來記述，以國家和其中一員的觀點視為相同的必然性上，並不存在任何合理的理由。

和台灣相同是日本殖民地的韓國，舉行了以殖民地統治為主題的研討會，參加研討會的佐藤感覺出在研討會發表論文時有不調和之感，指出「談論殖民主義」所具有之政治性和近代學術內部有關殖民主義之問題點³，以對統治殖民地批判的日本人研究者對政治性的不自覺作為課題（小森陽一・佐藤學 2001：13 - 14）。處理日本近代文學的桂，接受佐藤的指教，指摘論述出殖民地支配者之陷阱，表示「以近代知識的制度為基礎提出論文的我們，正孜孜不倦的築起知識的帝國。不論在學會和研究會發表、寫成論文或者講授課業上，自己是否不知不覺排除了什麼、隱藏了什麼或者是抑制了什麼？侷

3 佐藤不管有大半聽眾都是韓國人，在研討會中英語是通用語言，日本研究者在韓國發表有關殖民地統治和戰爭的責任這件事情上，發現「自我滿足的研究」。Representation的政治性大量被指摘出，在此筆者想討論一下日本人關於過去殖民地問題的研究。

限於沒有自覺和問題意識的情況下，不管如何去做反殖民地宣言、哪裡有作為超越殖民地化力量的作用，反倒是成為殖民地化產生過程的支持者(袒護者)存在了。(桂 2003：138)」

筆者是以日本舊殖民地的台灣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者。在本篇論文中，以台灣教科書的記述和這些指摘為出發點，想思考看看筆者本身記述所帶有的政治性。作者由1994年9月至1996年5月在台北市玉山(假名)區進行田野調查⁴，之後也斷斷續續的來台灣進行調查。根據這些調查所得到的資料，在2001年廣島大學提出撰寫《關於台灣都市化的社會人類學研究—以『會』的組織機能為中心》(以下省略，《台灣的都市化》)的學位論文。後來，為了要考察戰後台灣漢人社會中日語的機能，2002年9月在台北進行了田野調查⁵。此次調查中的體驗，促使以《台灣的都市化》的筆者重新考慮對玉山歷史的認識。因此本篇論文中，比起以去年的調查資料來批判檢討作者在民族紀錄中所看到的記述方式，倒不如以1945年8月15日這個歷史的劃分為大前提，將掌握的台灣歷史意識問題化，像這樣的記述方式，在思考台灣社會之時，何種問題會忽略掉就很清楚了。

1. 由學位論文看出作者的歷史認識

在《台灣的都市化》裏對於急劇的人口流入都市化的少數玉山當地居民是如何應對的，透過「會」的組織(同姓團體、寺廟組織、互助會等)的分析就很

4 1994年9月以後，由衷感謝在調查協助我的玉山人們。對於1994年9月到1996年5月的現場調查，承蒙財團法人民族學振興會的協助。在此表示感謝。

5 對於2002年9月的調查，承蒙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台交流中心的「2002年度歷史研究者交流事業」的協助。在此表示感謝。

明瞭。⁶玉山『會』的組織，與其說是互相幫助的組織，勿寧說是當地居民看清楚了有實力的移民者認定當地居民的價值觀，其組織具有拉攏人心的功能。

在《台灣的都市化》中，筆者將漢人開拓之後的玉山歷史區分成三期「第一期：漢人開始移居到19世紀中葉」、「第二期：19世紀後半到1945年」、「第三期：1945年以後」。具體的敘述如下：⁷

漢人開拓之後玉山的歷史可以區分成三大部分。首先，由開拓初期(17世紀後半)到清朝咸豐年間(19世紀中葉)為止，這個時期玉山以台灣全土最繁榮的區域之一而聞名。此繁榮的根源在於和中國大陸的交易。玉山在開拓之後不久，就因為是兩條河川匯流的地點之自然地理條件，而成為連結上游台灣北部各區域之上游與中國大陸泉州或北部的交易港而繁榮。在以物資集散地而繁榮的玉山有三個主要的碼頭，這些碼頭的各個掌管者為三個姓氏的人。(中略)接著在清朝同治年間(19世紀後半)到日本殖民地統治時代為止，毗鄰玉山的地區快速發展，相對的是台北玉山地區地位變低的時期。地位變低的緣起是玉山發生了大規模的械鬥。(中略)再加上使玉山快速邁向衰退的原因，就是日本統治殖民地。殖民地時代(1895~1945)，統治台灣的日本人稱「內地人」，相對的，台灣的漢人無論出生何地皆稱「本島人」。(中略)最後從1945年開始到現在為止，是玉山的地位越發低落時期。戰後，內地人離去，外省人在玉山重新開始居住。在大陸本土國共內戰中戰敗的國民黨逃亡至台灣，伴隨著100萬人到200萬人的大量漢人由大陸本土移居台灣。(上水流 2001：30-32)

6 因為在台灣一般性的將這些組織稱為「○○會」，在《台灣的都市化》論文中匯集這些組織，記以「會」的組織。

7 在這裡不能論述，先將「殖民地統治」的問題除外，關於玉山在漢人移居後的說法和「原住民」的關係，在歷史記述上是應該檢討的課題。

筆者實行像這樣歷史區分的最大理由上是書寫者重視1945年，即是含有筆者的意識。在有關亞洲近代史的日本教育上，對於日本週邊地區的統治殖民地視為重要的話題，在思考和亞洲的關係的時候也反覆談論到這件事情。筆者也透過各式各樣的事物漸漸的的吸收這個觀點。例如，筆者在高中時代所學的世界史教科書中，可以看見以下的敘述。

…日清間的對立關係也加深，以1894年的甲午農民戰爭(東學黨之亂)為開端而導致後來了日清戰爭(1894 - 1895)。戰爭最後由日本獲得勝利，翌年簽下馬關條約。這個結果，清廷承認朝鮮獨立、對日本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諸島，支付賠償金、日本擁有通商的特權、與在港口設立企業等等。(村川堅太郎・江上波夫・山本達郎・林健太郎 1993：266，筆者所譯)

對台灣而言，1894年的日清戰爭即是日本勝利的結果。1895的日清戰爭中日本勝利的結果是1895年簽下了馬關條約，台灣正式成為日本的領土。⁹

另一方面，有關日本和台灣，在1945年前後有以下的敘述：

・・14日，日本方面在御前會議中依據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決定投降，15日向國民確定此事。從此結束了歷時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村川堅太郎・江上波夫・山本達郎・村健太郎 1993：266，筆者所譯)

・・中華民國隨著進行回收多年懸案的租界等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加上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而佔有重要地位。還於1947年頒布新憲法，翌年蔣介石當選總統。(村川堅太郎・江上波夫・山本達郎・林健太郎 1993：232，筆者所譯)

8 類似記述有，包括有尾形勇等七名所著的《世界史B》第269頁，高橋秀、堀敏一、松井透、今井宏、西川正雄、富永幸生等所著的《高等世界史 最新版》的252頁，平田嘉三等八名所著的《高等學校 改訂版 世界史》的246頁中可以看到。但是，第一學習社的教科書中沒有明記「日本的勝利」而記載著「日本是佔優勢的」。

關於1945年8月15日，在其他的教科書中也有類似的記載⁹。也即是說，於1990年前後的世界史教科書中記載了在1945年8月15日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另一方面，日本戰敗、把台灣歸還給當時的中國政府這樣直接的表達方式，在這些教科書中並不能看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說明中，呈現出「在持續長達15年的抗日戰爭下之中國，在戰後收回了東北地方和台灣」這樣的程度¹⁰。

筆者在進大學之後，在手邊有關台灣的學術入門書中，台灣也是被記載為日本的殖民地。然後，關於1945年前後，被稱為專為了解台灣之入門書的兩本新書有以下的敘述。首先，是戴國輝所著的《台灣—人民、歷史、心性》的「光復の明と暗，二二八事件の悲劇」在此章中，是以「1945年8月15日，天氣熱的發昏。在前一天預告廣播中，得知正午天皇陛下將有重大廣播的人們，都固守在收音機前。（筆者所譯）」為開端。其次，若林正丈所著的《台灣—變容し躊躇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中的第三章〈『中華民國』がかつて来た——二二八事件と中國内戦〉，就是以「1945年8月15日為太平洋戰爭之結束（筆者所譯）」這樣一篇短文為開頭¹¹。兩者其後都以1945年8月15日為起點。

將1894年、1895年、1945年和1945年8月15日做為極重要且明顯的時間區分是筆者對歷史的認識，儘管就是一部分，筆者在接受了有關日本和台灣的

9 帝國書院的教科書中，記載著「在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在9月2日簽下投降書。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以聯合國勝利而結束(高橋秀、堀敏一、松井透、今井宏、西川正雄、富永幸生1982)」，在9月2日談到。還有「聯合國勝利」這樣的表達可以在幾本教科書中看見。

10 高橋秀、堀敏一、松井透、今井宏、西川正雄、富永幸生1982：324之中也有類似的表達。

11 和此記述有所對照的有在本篇論文的「前言」中介紹的《認識台灣》。還有在日本出版的書籍中，張士陽所著的《もつと知りたい台灣》第二版(弘文堂1998)中也有以下的記述。「日本殖民地統治期の台灣」的末尾部分並未提及8月15日，記載「以45年10月25日在台北舉行的受降儀式，日本的台灣的殖民統治（原文為日語）」。然後，繼此章後「第二次大戰後の台灣」為開頭，開始寫著「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等的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委員繼續日本殖民地當局的政權」（原文為日語）。以8月15日為分歧點此事，只有一個看法由此也可以充分理解。

這樣敘述而寫了論文。

但是，並非因僅僅這樣認識而產生推斷《台灣的都市化》的時代區分。在實地聽取調查的內容也有影響。筆者由歷經台北都市化的「當地居民」的觀點來進行記述，對筆者而言所謂的當地居民就是在調查地屢次偶然聽到的「瓊譚人」¹²。而「瓊譚」就是由清朝開始到日本統治殖民地中葉為止所使用的玉山之舊稱。在清朝末期，玉山在台灣也是極為繁榮的地區之一，所謂「瓊譚人」就是與那樣過去光榮歷史有密切關係的辭藻。關於這個詞藻具體的在調查地聽到了以下的敘述：

為客家人的筆者房東(父親在日本殖民地時代從台灣北部移居到台北市。和擁有在清朝時移居玉山的祖先之女性結婚，調查時為70多歲)以熟練的日語道出「真正的玉山人，即所謂的當地居民是從日本時代開始之前就住在玉山的人們吧。」同樣的，擁有在清朝末期就移居玉山的祖先之三十五、六歲(調查當時)的朋友也這麼說。筆者常常拜訪的寺廟管理委員會董事(祖先在清朝末期時移居玉山，調查時70多歲)也說「在日本殖民地時代來這裡的人，並非真正的玉山人。」當然，戰後移居的人不包括在「瓊譚人」和「真正的玉山人」之內。身為在台北有名的寺廟董事的男子(調查當時70多歲)說「作為支撐清代繁榮的人之子孫的我們才是真正的瓊譚人」。他是三邑人，而且是三姓之人。三邑人就是在開拓時期來到玉山的移民中佔了半數來自大陸的三個區域(福建泉州的惠安縣、晉江縣、南安縣)的移居者和他們的子孫，他們在玉山自稱「三邑人」，也被別人這樣稱呼。而且，「三姓之人」就是在三邑人中，在玉山繁榮時期完成重要任務的劉姓、孔姓、羅姓的人們。

還有，擁有在清代末期移居玉山祖先的顏姓女子(調查時70多歲)說「為三

12 台灣的漢人是中國本土的移民，在玉山從清朝末年到國民黨來台之間不斷的斷斷續續有中國本土來的移民。再加上，在台灣北部的中心地玉山有許多人由中南部移居而來。在這樣綿延不斷的移居歷史上，並不存在將「當地居民」和「移居的人」來做區分的條件，筆者有必要假定。

邑人的三姓之人是真正的瓊人。」在調查地屢次聽到的是「戰後從台灣中南部而來的新人，他們並非瓊人」這樣的話語。戰後，從台灣中南部移居玉山的張姓男子(調查時60多歲)說「因為自己並非當地人，最初為了做生意，吃了不少苦」像這樣的事情是常常有的。

在玉山，將從距今300年前左右開始的開拓時期到日本統治殖民地開始統治為止的這段時間移居台灣的人之子孫視為瓊人。其中三邑人才是真正的瓊人，並且也有人認為在三邑人之中三姓之人在玉山才更是純粹的瓊人。瓊人是具有這樣的內情的。

筆者在《台灣的都市化》論文中，以日本殖民地時代之前移居而來的人及其子孫認做為當地居民，除此之外的人們，其中以調查時佔大多數玉山人口的戰後移居而來之人們認做為新居民¹³。像這樣在《台灣的都市化》中採用此將所謂日本殖民地時代以前、以後的時間作為架構，在《台灣的都市化》裏，1945年在調查地的歷史的說法上成為很大的時間基準點。

2. 對所謂1945年8月15日這個區分的質疑

2002年實行的田野調查目的是透過接受過日本教育的一代和其子孫的一代的聽取調查來探討日本殖民地時代的遺產「日語」對於現代台灣社會的認同意識，特別是在老一代有什麼樣的影響。

雖然透過這項調查而深深感到的事情當然是有的，在實際的生活中日本和台灣的關係並不是以1945年和1945年的8月15日為界線斷絕的這一點。的確

13 不能充分得到在日本殖民地時代進入玉山的人的經驗，是以殖民地區分的《台灣的都市化》論文中的大的問題點之一。

日本的戰敗對當時的台灣人民而言可以充分的推測出具有相當大的意義。例如，在戰爭即將結束的報紙上沒有的爵士音樂會和餐廳的廣告在8月15日以後的『臺灣新報』中刊載出來。(在9月18日、9月28日的報紙)由此可以看出從戰爭中所謂「奢侈是敵」的想法中解放後之人們的歡愉。此外還有，「製作中華民國國旗（原文為日語）」(9月15日『台灣新報』)和「教中文（原文為日語）」(9月1日『台灣新報』)的廣告也有刊載¹⁴。由此也許可以推測出台灣人民對於離開日本殖民地統治，而能回歸祖國的歡愉。

但是，在1945年8月15的區分上，台灣人民的生活不能完全從「日本」切離。國民黨公佈將日本紙幣回收是從戰敗一個月後的9月15日開始，日本銀行在台灣發行紙幣一律禁止使用是之後大約兩個月後的11月7日。此外，台灣新報接收日語報紙是在1945年的10月27日，到翌年的1月4日依然印刷日本語版。教育部派遣官員實行促進使用「國語(中國語)」¹⁵是1945年的10月27日。然後在中學被禁止日語的使用是1946年的9月14日的事情。(中國時報 1995：14 - 25)

然而，在那個時期筆者的好友在中學時是使用日文在進行教育。戰敗時曾在京都帝國大學學習為台灣漢人的他回台灣之後，據說用日語在中學授課。不久之後，外省人的校長來擔任，要求即使國語不行至少也要用台語(閩南語)，因為實在不適應，所以回台北做台灣大學的學生。據本人所述那大概是1947年的事情。此外，據台灣大學畢業的另一位人士說，雖然台灣大學的入學考試和授課的一部分是實行日語的，但畢業考試卻是中文。因此在畢業考的準備是很辛苦的。

雖然1945年的11月1日之後，日語城鎮名稱的使用一律被禁止(中國時報

14 19日刊載的廣告上也有「北京語」。

15 ()前之語在資料上，也是調查對象所敘述的話語。()中是筆者的所記。以下有關言語的寫法仿造此例。

1995:15)，侷限於筆者做的確認，在1948年到49年的『自立晚報』的報紙的一部分廣告中還記述著日語的地名(在1948年1月24日・1949年1月1日・4月3日的報紙)，日語唱片的取締是從1946年8月7日開始實行，日式人名在1946年10月19日起被禁止(中國時報 1995:20 - 25)。根據筆者的聽取調查，在當時的生活中日語的使用也很普通。因為日語使用太過於自然，在實際的生活中若以1945年為界線，倒也並非是日語的使用完全被禁止，日語在公共場所全被清除。由這些事情的立場來思考，在台灣人們的生活和日本關聯的敘述上，沒有必要將「1945年」甚至「8月15日」來做大寫特寫。

再加上以下3點把1945年這個時間區分的重新考慮上，對筆者而言帶有重要的意義¹⁶。第一，對1945年所具有的意義因學歷而不同。例如，在「台北高等學校」畢業而進入醫學系的男生在日本戰敗時強烈的感受到「對沒有朋友、完全不會說台語(閩南語)的自己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又該如何應對以後的生活」。多數的高學歷者感到日本的投降是讓自己平常世界急速轉變的原因。由此可知，他們將1945年8月15日看成為具有重要的意義。

另一方面，「公學校」畢業和中途退學的人在戰爭結束後鬆了一口氣，因此出現的說辭是，「自己的生活沒有太大的改變(公學校中途退學的女性)」和「不管是日本還是國民黨，因為僅僅改變統治者，對於沒有錢的我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吧。那時(日本戰敗)是四萬元變成一元的時候影響很大(公學校畢業的男性)」等之類的事。限於筆者所知，他們並沒有高學歷者那樣深深感覺到因日本戰敗而使日常生活驟變。

比1945年日本戰敗更是他們人生的轉戾點就是，1947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這和學歷無關是大多聽者的共識。這個是第二點¹⁷。例如，台北高等學校

16 對於詳細的調查，請參照在台日交流中心所提出的「研究活動報告書」和「研究成果報告書」。

17 但高學歷者接觸日本戰敗和二二八事件的比較多。

畢業後進入醫學系、現在開著診所的男子說「二二八事件之後不能公然說日語了」，而公學校畢業，於戰後做生意的男子則說「因為二二八事件我的人生突然改變。因為說了國民黨的壞話，不能待在家鄉因而來台北」。除此之外，大多數人都說在公眾場合說日語是很難的。

第3點為同一個人矛盾的發言。在1995年前後的調查裏，以「我們(當地居民)」和「其他人」區分的基準列舉出「戰前」和「戰後」的人物，在回顧自己的歷史時是將「二二八事件」當成一個重要的區分。也即是說，在同一個人物中對於過去並存著兩種想法¹⁸。台灣在1996年總統民選中李登輝當選總統，再於4年後民進黨的陳水扁成為總統。在這變化中成立了二二八公園，二二八事件被大幅地被提及，口述歷史的聽聞興盛了起來。這些本身對過去的認識有了變化，同時改變那些認識的行為並沒有錯誤。

不能與台灣人共同擁有這樣變化的筆者，與他們對於歷史的認識感到分歧是當然的。那是因為在思考台灣的歷史上對於筆者自身於1945年和其8月15日當為界線抱持著疑問。

3.1945年8月15日這個區分的問題點

在《台灣的都市化》的論文中來述說調查地的歷史時，筆者在連接線(沒有區分)上不過是將某個時間點的1945年8月15日納入來做重要區分的記述。那是以在日本形成筆者自身的歷史認識作為前提，在調查地聽取說法是筆者自己創造之所得。但是，去年九月的調查對調查地的人們來說認清了1945年和

¹⁸ 雖然是可以看出矛盾的歷史認識，依聽者的意圖和談話者的情況，而變化未考慮到此並非不可思議。

其8月15日所持有的各式各樣之意義。知道過於簡單化會有危險但還是膽敢直言，筆者看出在高學歷的人和學歷不高的人之間，對於1945年8月15日所持有的意義上似乎有所差別。而且，在接受台灣政治變化的說法上，二二八事件是以重要的歷史事件被道出，對人們而言戰敗(或者是台灣解放)和二二八事件不是矛盾而是以重要的事件存在著。

這些事情，在述說調查地過去時，已顯示出1945年甚至是同年的8月15日不是絕對的界線，筆者自身無意識的將1945年和8月15日特權化的事情突出地刻劃出來。然後，以此為前提記敘對調查地人們的過去歷史，這樣的行為結果忽略了各式各樣的問題。

首先為了重視人們是否受過殖民地教育的這個區分，沒有注意到受過殖民地教育人們的多樣性。輕視性別和階層、學歷、年齡等等的不同，以這些相異點為基礎而將他們的殖民地經驗均質化。

其次，因為以1945年和8月15日為重要時間的區分，而忽略了說明為什麼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時間。因在某個連接線上置入區分，故照理在那裏被區分應存在正當性化的動向。台灣社會對1945年給予意義究竟為何，為何當地的人將它視為自然的區分而能接受，由於將1945年區分及8月15日之區分視為理所當然，所以這些問題點的分析、考察是不可能的。

針對這個問題，可以參考受過日語教育年輕一代的黃智慧的論述。黃智慧以「戰後」的台北所擁有的「戰勝國首都」和「戰敗國的殖民都市」的兩個情況為重點，以前者的面孔覆蓋後者面孔的一個事件，列舉出「終戰」（戰爭結束）和「光復」的問題。黃智慧做了以下的敘述「以更大的象徵的時間，即8月15日的戰敗或終戰之日，台灣將它視為宛如什麼都沒變的平常的一天。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來接收的10月25日，稱為光復節，成為國定假日，國家和地方政府舉行了大大的紀念活動和慶祝集會。以這樣的記憶裝置的空間和時間重新被塗改的事情，對於步入那激烈時代的人們而言，腦中的記憶應該是

不會被抹滅的（筆者所譯）」。

雖然黃智慧的記述似乎是重視8月15日，但並非「8月15日果然真的很重要」。黃智慧的論點是對於在台灣將10月15日視為理所當然的區分之事有所懷疑，在此指摘出被忽視的日本語一代的記憶。這個指摘在時間上不存在絕對的區分，以各式各樣的措施來區分重要的時間，即是做歷史的認識，在著眼於這些爭論。將「終戰」和「光復」的爭論與台灣的政治狀況之成立經過，日本統治殖民地的結束與國民黨的參與有關而強調「光復」這件事，具有向本省人掩蓋二二八事件所代表的國民黨統治的失敗的作用。

將1945年特權化的記述不只是「台灣」，也包含了「記述者」為何將這個區分特權化的這個問題。如開頭所述，日本人研究者以日本的觀點來寫論文，沒有某些合理的理由。更何況，將中華民國觀點和變動之台灣人的認知考慮進去的話，進行過去記述的人，為何採用某個區分是關於Politics of History重要的問題，為何採用某種區分呢？取入國家國民的觀點的自己無法對象化，以此觀點無法認知敘說台灣的意義，不過顯現出其對Politics of History之無知。正因為如此，所以毫無疑問的將1945年特權化。不是1947年而是1945年，不是10月25日而是8月15日，來作為時代區分的基準點，雖然是以大日本帝國和日本國的視點將台灣刻上記號的行為，但因要將這個區分客觀且中立的理解，不僅無視台灣人民歷史認識的多樣性，也忽略自身參與以殖民地的眼光在佔領台灣殖民地化過程中的行為。結果，落入了佐藤和桂所指摘出的陷阱中。

但是重視1945年，認為是日本人自我意識的膨脹，將貼近台灣現狀的二二八事件作為區分是否恰當來說的話，就很清楚的知道並非如此了。不能將過去的認知照連接線的來記述，必須在某個地方劃入區分。將二二八事件作為區分也是在連接線上任意區分的行為。如果，將二二八事件作為理所當然的區分的話，筆者自身在《台灣的都市化》論文中也就反覆的犯了與過去的同

樣錯誤。將台灣人各式各樣的經驗還原到「外省人」和「本省人」這兩項對立之中，忽略有關記述二二八事件權威化的政治性問題。

因此在記述過去的認知上所被需求的事情，包含了將某些區分特權化之理由的記述吧。為何一定要將殖民地之前與之後分開來記述，為何一定要重視二二八事件不可。包括某些事件特權化之依據的敘述，就在民族誌的記述中去尋求吧。

為了這樣的工作，分析歷史認識到底是在何種的社會、經濟、政治的狀況下產生是有必要的吧。例如，超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中國」對本省人而言是近年來實行「本土化」的一環。他們感覺到雖然在台灣內部，推翻國民黨政權贏得政治的自由，但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上，他們感到對中華文明中心地「中原」的「大陸(中華本土)」是個幻想。

能夠超越兩個「中國」是台灣社會大規模的經濟發展及同「大陸」的接觸。在經濟上，台灣將1970年代為界線的國民總生產額大幅增加。台灣的國民總生產額在1970年約為1952年的3倍、在1980年約為17倍、在1985年約為23倍，1970年代到1980年代間飛快的伸展。接著產生中產階級，也邁向高學歷化。更且產業的結構也有很大的變化。在1952年有過半數的人口是農業人口，但在1987年時卻變成了約15%。電視在1970年代普及、通信與交通方式發達，人們的活動範圍遍及台灣全省。觀光產業也發展起來，各個地方也產生了觀光地(Hermalin, A., Liu, P.K.C. and Freedman, D. 1994, 若林正丈・劉進慶・松永正義 1994, 沼崎一郎 2003)。能流暢的說國語的高學歷本省人、中產階級的出現，讓本省人的政治重要性大幅的提升。

在和「大陸」的接觸點上，1987年以後，前往「大陸」的航渡被解禁。他們以工作、觀光和電視來了解「大陸」的樣子之時，常說「大陸」是「既不方便也不富裕的地方」。在「大陸」設工廠的某個社長，時常感嘆到「大陸」並非法治國家，賄賂橫行。應會感到被認為是中華文明中心的「大陸」比

自己國家還落後。根據這樣實際體驗的想法是，生出了台灣並非是中華文明的邊緣，和中華文明的中心地「大陸」比較起來並不遜色的意識。最近「大陸妹」為了從事性工作而偷渡來台，也撐起台灣部分人民對「大陸」的優越感。更何況，來看由於文化大革命被破壞、否定老舊文物的「大陸」，台灣人們因台灣保有中國古老文化而自豪。像這樣台灣人民和「大陸」的直接接觸，而能描繪出「進步台灣」的自畫像。

另一方面，和現在「大陸」經濟上關係的深化，在台灣也改變了對日本的印象。2003年上半年台灣當局許可對中國的投資金額是51億2000萬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倍以上(台灣通信 2003:4)。這樣巨大的投資和金額的急速增大，陳水扁政府提出警訊也鼓勵往東南亞投資。台灣和「大陸」經濟上的聯繫急速擴大，相對的和日本關係的重要性降低了。因此對日本的印象改變也是理所當然。日本不再是像以前那般是富裕的根源。

如上所述的狀況之中，由近年來台灣人看過去的認知不但形成且廣為流傳。依據這樣的敘述記述歷史的時候，在踏某種歷史認識被生成的社會條件，在掌握批判的捕捉某事件的特權化上是不可或缺的工作。¹⁹

結語

筆者在寫《台灣都市化》的論文是配合政治上的區分，用在調查地所得到的資料來編輯，僅僅是做故事的敘述。將政治上的事件清楚的證實是研究社

19 此點在去年的台灣學會發表上為沼崎一郎氏所指摘。接受這個評語而開的本研討會中，台灣社會的變化和記憶的問題慎重的被論說這件事情，雖然是筆者研究的話題，此次因為筆者的調查不足和能力不足而談到關於「大陸」和「日本」。

會對象上不可欠缺的行為。因此，以國家和國家的歷史來描述過去時，或以 National State 的觀點為中心來做政治學的記述的時候，1945年還有當年的8月15日、10月25日來被以重要的區分點來記述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並非以國家國民的觀點，而以生活者的觀點來描述該社會的人類學者，強行將日本的「戰後」和台灣的「光復」等等拉入民族誌來記述，不就是忽略了和所謂的政治上的歷史而以不同的形式開展的其他歷史嗎？由此點也可了解到先前黃智慧的討論是重要的。這論點並非國家對國家，而是以國家和老一代的本省人為焦點。黃智慧在聽取人民的談話指出中，存在著一種無法載入國家史冊的另一種歷史，他強調應該看到作為國民而無法整齊畫一的存在。

以生活者記憶為根據之過去的記述，由上述看來，台灣社會的變動和接受政府的政策是改變的原因。因此，假如即使有「客觀的」記述的可能，幾乎沒有人會將那樣的記述當成「客觀的」。在此，產生以「人們的記憶」為依據的歷史之歷史說法上的批判。

但是，與其「因此沒有意義」勿寧還是以人們記憶為基礎的人類學者之歷史記述較有意義不是嗎。無論怎樣記述過去也有是由某個人的觀點來看的認知上之說法。和國家等所做的主流說法一樣。但是，那樣的說法，藉由教科書等各式各樣的媒介的正統的說法是表象。在那樣的狀況中，由和 dominant 觀點不同的立場來記述過去告訴我們，對某段歷史的敘述是客觀、中立、學術本身提出質疑，那樣歷史的敘述不過是建構出來的。在歷史說法與國民國家成為問題之現今²⁰，人類學者在敘述歷史時具有重大的意義²¹。

20 關於日本的論說有1998年小森陽一/高橋哲哉所編、2001年成田龍一所編等。

21 將政治的時間軸相對化的行為，也就是擺脫「通過《自己—民族—國家》這單純的三個層次來闡述同一性（松田 2002：485）」。

人類學在民族誌上由對無時間性的記述之反省漸漸的轉向對歷史(杉島敬志 1999:319)，在此情況歷史學者還有人類學者本身常指摘、批判人類學者對歷史之單純。故或許有對於調查過去事件方法過於鬆散的批判，而且容易依賴政治上的歷史，並非將歷史的區分相對化，對於書寫這個行為之批判也包含在內不是嗎？在根據人們的記憶所記下的歷史，常常存在著表象的暴力問題。但是，那樣的記憶依據國家的觀點隨著歷史而無意識再編輯述說的話，對人類學者之批判會更嚴酷吧。

～引用文献～

邦文

◎尾形勇他7名

1994 『世界史B』 東京書籍株式会社

◎桂 文子

2003 「書評 栗原彬・小森陽一・佐藤学・吉見俊哉編『知の植民地：越境する』東京大学出版会」『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広島大学大学院国際協力研究科）4

◎上水流久彦

2001 「台湾の都市化に関する社会人類学的研究－「会」組織の機能を中心として」
広島大学学位論文

◎黄智慧

2003 「ポストコロニアル都市の悲情－台北の日本語文芸活動について」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アジア都市文化学教室編『アジア都市文学の可能性』清文堂

◎小森陽一・佐藤学

2001 「プロムナード：知の植民地をめぐる断章」小森陽一他編『知の植民地：越境する』、東京大学出版会

◎小森陽一・高橋哲哉編

1998 『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を超えて』、東京大学出版会

◎杉島敬志

1999 「人類学の歴史研究－バリ宗教の近代史」栗本英世・井野瀬久美編『植民地経験 人類学と歴史学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人文書院

◎戴國輝

1988 『台湾－人間・歴史・心性』岩波書店

◎高橋秀、堀敏一、松井透、今井宏、西川正雄、富永幸生

1982 『高等世界史 最新版』帝国書院

◎台湾通信

2003 『週刊 台湾通信』92・35 台北

◎ 張士陽

1998 「歴史・地理・自然」 若林正丈編『もっと知りたい台湾』第二版、弘文堂

◎ 成田龍一

2001 『〈歴史〉はいかに語られるか 1930年代「国民物語」批判』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 沼崎一郎

2003 「現実の共同体、架空の政体—台湾社会の変容と『新しい台湾意識』の出現—」『東北人類学論壇』創刊号 東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化人類学研究室

◎ 平田嘉三他 8 名

1986 『高等学校 改訂版 世界史』第一学習社

◎ 松田素二

2002 「創られた王国の彼方に—西ケニア・ワンガ王国史の歴史語りから」山路勝彦・田中雅一編『植民地主義と人類学』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

◎ 村川堅太郎・江上波夫・山本達郎・林健太郎

1993 『詳説 世界史』山川出版社

◎ 若林正丈

2001 『台湾—変容し躊躇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筑摩書房

◎ 若林正丈・劉進慶・松永正義編

1994 『台湾百科』第二版 大修館書店

中文

◎ 中國時報

1995 『台灣：戰後50年 土地 人民 歷史』台北

◎ 國立編譯館主編

1993 『認識台灣（歷史篇）』台北

英文

◎ Hermalin, A. , Liu, P.K.C. and Freedman, D.

1994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In Thornton, A. and Lin, Hui-Sheng(eds), *Social Change & the Family in Taiw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